

中国语境下 外语教育的行动研究观 与思辨能力培养

ZHONGGUO YUJING XIA WAIYU JIAOYU
DE XINGDONG YANJIUGUAN YU SIBIAN
NENGLI PEIYANG

● 阮全友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境下
外语教育的行动研究观
与思辨能力培养

ZHONGGUO YUJING XIA WAIYU JIAOYU
DE XINGDONG YANJIUGUAN YU SIBIAN
NENGLI PEIYANG

● 阮全友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境下外语教育的行动研究观与思辨能力培养 / 阮全友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19-3718-1

I . ①中… II . ①阮… III . ①外语教学 - 研究 - 中国 IV . ①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5480 号

书 名: 中国语境下外语教育的行动研究观与思辨能力培养
ZHONGGUO YUJING XIA WAIYU JIAOYU DE XINGDONG
YANJIUGUAN YU SIBIAN NENGLI PEIYANG

责任印制: 陈 辉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82303650 / 3591 / 3650

编辑部 010-82303700

读者服务部 010-82303653

网上订购电话 010-8230390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 数: 22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718-1 / H · 13307

定 价: 32.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2303590

前言

外语教育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领域，许多研究人员和教师都在这一领域里默默耕耘。作为一名从事外语教育的普通教师，作者在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始终关注学生的专业发展和人文需求，以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前进动力，在教学中不断尝试，不断反思。刚开始时，这种教学中的思考和实践更多的是出于自发和直觉，直到后来在理论学习中接触到行动研究，于是，国外与之相关的研究和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产生了很多共鸣，自己的实践终于找到了理论的根基。因此，对于行动研究理论，作者可以说是深有同感，也可以说是相见恨晚。随后作者就开始了进一步用行动研究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并将行动研究中“教师作为研究者”的理念延伸至“学生”，于2005年提出“学生作为研究者”的理念，对行动研究理论进行拓展。这是本书行动研究观的雏形，作者曾一直计划写书专门探讨，但由于生活和工作的琐事一拖就是几年。

2007年，一次偶然的会接手英语专业“基础英语”课程的教学，了解到了英语专业学生语言学习的困惑与抱怨。随后几年的教学中，作者就不断尝试通过行动研究观的理念激发学生和教师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的主体性和思辨性，教学效果较为明显。而作者行动研究中对学思辨能力的关注又恰好与黄源深教授2010年发表在《外语界》上的文章《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产生共鸣，于是了解到黄教授其实早在1998年就已经警示过中国外语学习者“思辨缺席症”的危害。此时，作者的行动研究观与中国外语学习者思辨能力的培养产生了交集，更激发了作者出版此书的强烈愿望。

对于作者来讲，行动研究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而是作者长期在教学实践中质疑、批判、反思的结果；对思辨能力培养的关注也不是偶然，而是行动研究中解决现实教学具体问题的实际需要。行动研究观关注了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的长期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这一过程中，思辨能力是实践中师生双方都可以得到常态化训练的能力，也是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思辨能力的核心理念直接导致作者将行动研究观的理论基础从西方单一语境下的讨论批判性地延伸到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下探讨。因此，结合了中西文化内涵的行动研究观更能够从实践的角度去进行东西文化的对话，更能够在外语教育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和多元立场的思辨。在经济全球化和英语国际化的当今世界里，这一点对于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意义

重大。

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和目的，以及意义所在。

第二章回顾了我国外语教育在古代、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着重引出现阶段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分析，并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点上导入行动研究的重要性。

第三章阐述了行动研究的基本理论。

第四章通过作者亲身参与过的教学实践来详细解说行动研究的相关操作程序。

第五章正式提出“行动研究观”，并结合其他研究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一方法论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第六章论述了行动研究观对外语教育中“思辨缺席症”的解读及其理论上的意义，并通过教学研究中的实例来说明行动研究观对思辨能力培养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

第七章是关于如何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角度来进一步拓展行动研究观和思辨能力培养的内涵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写作是作者1996~2011年期间从事外语教育工作以来的一个小结，在此也要感谢一直以来很多领导、恩师和朋友的帮助与鼓励。他们主要有：黄冈师范学院的蓝葆春教授、肖惜教授（现三峡大学）和余健明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雷小川教授、樊葳葳教授、陈俊森教授、徐锦芬教授、周江林教授、孙云梅教授、许明武教授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谢群教授、谢艳明教授、李剑波教授、胡憊教授以及各位同事；苏州大学的顾佩娅教授。最后也对夫人、爱子以及家人长期以来在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的核心思想和内容是作者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于混合学习理论的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研究——以基础英语教学为例”（课题编号10YJC740088）的研究成果，部分内容也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课题“基于学习共同体的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研究”（课题编号GPA105031）的资助。

阮全友

2013年10月

● 第一章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动机	2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 第二章 我国外语教育回顾	5
2.1 古代的外语教育	6
2.2 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外语教育	6
2.3 新中国成立后的外语教育	11
2.3.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语教育	12
2.3.2 “文革”时期的外语教育	14
2.3.3 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育	16
2.3.4 世纪之交以来的外语教育	18
2.4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语教育总的特点	23
2.5 我国外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6
2.6 我国外语教育中的问题诊断	32
● 第三章 行动研究概述	37
3.1 行动研究的定义	37
3.2 行动研究的参与者	39
3.3 行动研究的实施地点	40
3.4 行动研究的一般过程	40
3.5 行动研究的主要特点	45
3.5.1 参与性	45
3.5.2 实践性	46
3.5.3 反思性	46
3.5.4 合作性	46
3.5.5 共享性	47
3.6 行动研究的目的	47

3.7 行动研究在中国	48
● 第四章 外语教育中的行动研究	55
4.1 案例一：英语口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	55
4.1.1 研究背景	55
4.1.2 问题诊断	56
4.1.3 教学设计	57
4.1.4 教学行动	58
4.1.5 教学评估	59
4.1.6 英语口语教学行动研究反思	61
4.2 案例二：英语远程教学中的合作行动研究	67
4.2.1 英语远程教学中的合作行动研究循环一	67
4.2.2 英语远程教学中的合作行动研究循环二	69
4.2.3 英语远程教学中的合作行动研究循环三	82
4.3 案例三：外语教师教育中的行动研究一	87
4.3.1 研究背景	87
4.3.2 问题诊断	88
4.3.3 教学设计	89
4.3.4 教学行动	94
4.3.5 教学反思	96
4.4 案例四：外语教师教育中的行动研究二	97
4.4.1 研究背景	97
4.4.2 问题诊断	98
4.4.3 教学设计	99
4.4.4 教学行动	101
4.4.5 教学评估与反思	103
4.4.6 案例四的行动研究反思与国外理论研究的比较	105
4.5 案例中外语教学的反思	108
4.5.1 文献调查	108
4.5.2 行动研究以及对行动研究之研究	110
4.6 国内外行动研究的反思	114
● 第五章 外语教育的行动研究观	118
5.1 行动研究观的基本内涵	118

5.1.1	行动研究观与研究方法.....	119
5.1.2	行动研究观与研究的参与者	124
5.1.3	行动研究观与教学方法.....	132
5.1.4	行动研究观与学习方法.....	138
5.1.5	行动研究观与混合学习理论	142
5.1.6	行动研究观与“后方法”时代	146
5.1.7	行动研究观与复杂科学理论	151
5.1.8	行动研究观与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	154
5.1.9	行动研究观与行动研究的目标	158
5.1.10	行动研究观与实践共同体	161
5.1.11	行动研究观与教育生态学	163
5.2	行动研究观的总结.....	167
5.2.1	行动研究观的目标.....	168
5.2.2	行动研究观的核心.....	168
5.2.3	行动研究观的根本方法.....	169
5.2.4	行动研究观的核心纽带.....	170
5.2.5	行动研究观的操作模式.....	172

● 第六章 行动研究观与外语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养 173

6.1	我国外语教育中“思辨缺席症”的主要表现.....	173
6.2	行动研究观对“思辨缺席症”的解读	176
6.2.1	角度一：行动研究观的目标	176
6.2.2	角度二：行动研究观的核心	176
6.2.3	角度三：行动研究观的根本方法	177
6.2.4	角度四：行动研究观的核心纽带	178
6.2.5	角度五：行动研究观的操作模式	179
6.3	国内外思辨能力的研究现状	180
6.4	思辨能力培养框架的初步构建	185
6.5	行动研究观与思辨能力的培养	187
6.6	行动研究观指导下的思辨能力培养实践.....	195
6.6.1	思辨能力培养第一阶段实践	195
6.6.2	思辨能力培养第二阶段实践	201
6.6.3	思辨能力培养第三阶段实践	203

● 第七章 中国语境下的行动研究观与思辨能力培养	213
7.1 行动研究观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	213
7.2 思辨能力的培养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	221
参考文献	227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2000多年前，管仲辅佐齐桓公使得当时的齐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为齐国的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国迅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管仲的国家管理理念中有这么一句话抓住了治国的根本——“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到了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改动了一个字——“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字之差，既继承了原话的治国理念，又在事实和逻辑上更加严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粮仓充实，衣食富足，知荣知辱的观念才能够被人关注并深入人心，注重礼节、崇尚礼仪的行为规范才会是百姓自发、自觉、普遍的追求。

中国近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经历了百年磨难，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国的军阀混战，到抵抗日本的军国主义入侵，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和历尽风雨的积累，在近百年的战乱和动荡之中被洗劫得几乎空空如野、一贫如洗。这一点是我们讨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等课题所必须考虑的时代背景。“仓廩不实、衣食不足”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也因此建国初期的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都是为了一个基本的民生。十几亿人

的国家，在专注于“丰实仓廩、满足衣食”的经济发展中，必然会产生有关“礼节、荣辱”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和诸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整个社会对“工具性理性”的追求，而对“人文性理性”则相对忽视。表现在外语教育中，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哑巴英语”“全民学英语”“中国文化失语”“思辨缺席症”等问题。我们知道外语教育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保障对外交流和不同文化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作用，对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贡献非常重要。外语教育的发展也在经历不断的改革和调整，但是也存在着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问题。总的趋势是要从过去工具性的能力需求逐步过渡到现在的高层次能力需求。也就是说，在“仓廩不实、衣食不足”的建国初期，外语教育承担的任务主要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语言上的支持，从而带有明显的工具性；而现在“仓廩渐实、衣食渐足”的社会条件下，外语教育也应当考虑“礼节、荣辱”中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在现阶段，社会上对外语教育的质疑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作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认真反思我国外语教育这些年走过的道路，认清现实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分析教育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更加理性和成熟地对待外语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为将来的发展找到合理的出路和方向。

1.2 研究动机

外语教育在我国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制定教育教学政策和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全国上下各种考试、人才遴选的主要参考依据，不能不说外语学习已经影响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大家——“为什么要学习外语？”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回答是为了出国，有的人回答是为了考试，有的人回答是为了

移民，等等。因此，不同的人回答是不尽相同的；同一个人，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回答也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在学习外语的时候，是有必要经常思考这一问题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仅对学生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教师更重要。因为，教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一般会很直接、很自然地表现在自己教学活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运用、师生关系的处理、教育理念的传递等过程中。教师的理念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教师如何教学会影响到学生如何学习。这样一来，“为什么要学习外语”的答案其实就隐藏在教学与学习的实践活动之中。因此，本书中，作者并不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会通过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动研究观理论，结合外语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养，引导教师和学生对外语教学活动进行观察、体会和思考，来探求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理解。

另外，理解外语教育时，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基础是——培养外语人才不应只考虑市场需求，更应考虑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语言的本质是文化，是思维，是精神。因此，外语教育也就要求与文化有关，与思维有关，与人文精神有关。而且，不仅仅是与外国文化有关，也应当与本国文化有关；不仅与外语思维有关，也应当与两种语言的思维异同以及如何沟通有关；不仅与外国人文精神的学习和了解有关，也应当与双方人文精神的平等对话、双向交流有关。所以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是以作者的教学实践为基础，借鉴西方行动研究理论，融合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试图通过中国语境下的行动研究观来解构这些年来外语教育的得失，理清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路障，积极探讨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道路。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本研究的目的是总结作者从事外语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十幾年来的成长经历、实践体会、理论反思和理论创新过程，详细

地介绍作者如何从教学实践者，逐渐走向行动研究者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如何吸收国外行动研究的理论，如何批判性地发展该理论，并提出行动研究观理论；随后，在行动研究观的指导下，如何分析和解构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思辨缺席症”；最后，在结合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行动研究观。本书旨在通过作者成长发展的过程，让更多的在中国从事外语教育的教师们能够有所收获，并能够在自己的实践和研究中有信心找到更多适合中国外语教育的道路。

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来说，本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为国家长期发展中的语言教育战略与规划提供一定的思路。理论上，本研究继承和发展了行动研究，提出了行动研究观的概念，是行动研究在广泛借鉴教育中其他理论基础上的方法论升华，最后在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求学理念后，成为沟通中西思想、中西并重的教育理论实例，可以为以后中国教育界、外语教育界创新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实践上，通过行动研究观解构并解读当前中国外语教育中备受关注的“思辨能力培养”议题，为外语学习者思辨能力的培养提供不同角度的教学尝试，并为外语教育中学习者和教师的理性发展、语言身份建构、文化身份建构的实践形式提供具体的案例支持。对于我国外语教育的整体发展和前进方向来说，本研究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由于本书的研究是基于作者从事师范教育、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外语教育、大学英语教育、英语专业教育和教育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长期实践、思考、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总结，因此，对在我国从事外语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研究人员、教学管理人员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章 我国外语教育回顾

本书谈的是中国的外语教育，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外语教育进行回顾，找到历史进程中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其实，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与文化的国度，我们的外语教育并非只有这几十年或近100年的历史，也并非是有研究表明的700多年的历史（胡德映，1999），而是有着非常长久的历史，有非常多的历史和文化痕迹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这是我国外语教育的真正根基。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外语教育理论却几乎全部都是舶来品，这是我们一定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外语教育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自古以来，经秦汉唐宋到元明，同外国的交往一直十分密切，而这期间外语教育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保障，在我国的外语教育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外语教育的研究在我国其实是和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的结合。

本章首先介绍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外语教育，然后重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总结这一历程中的特点和问题，最后对我国外语教育的问题进行诊断，寻求解决问题的关键。

2.1 古代的外语教育

事实上,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以及《周礼》中有周制象胥“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而属秋官司寇”和“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之类的记载,在中国,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管理,就设置过一个机构的官员“象胥”(张正东,2005)。“象胥”是四方译官之总称,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官,主要是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刘军平,2005;苑艺、朱荣宽,1984)。

隋唐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对外交流在宗教、经济、外交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和“遣唐使”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到了元朝时期,政府设置的“回回国子学”是当时学习波斯语的专门机构(张同冰、丁俊华,2002b;张正东,2005)。在这之后,明朝的“四夷馆”(后改称“四译馆”)作为官方的翻译人才机构,主要负责对朝贡的国家往来文书进行翻译,并从事周边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教学(胡德映,1999)。“四夷馆”后来影响到前清俄罗斯文馆的建立。

这段时期,我国的外语教育基本上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交流活动带动的,是在以翻译促进交流为主要需求的社会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涉及的领域是宗教(主要是佛教)交流、与周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与古丝绸之路周边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贸易交往。

2.2 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外语教育

清代以来,在随后的国际形势中,随着世界各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周边大国俄罗斯,以及世界列强英、美、法、德等的发展壮大,以至后来频繁对华宗教、经济和武力入侵,外语教育的存在则主要服务于国际交往中的经济贸易斗争,甚至是武力的殖民和反殖民斗争,包括后来在民

族觉醒和国力发展需要中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需要。胡壮麟教授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外语教育时是这样总结的：“我认为它具有三个特性，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教会性和地域性”（胡壮麟，2009：5）。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是由晚清和民国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外语教育在当时是受封建制度的改良和列强的武力和文化入侵影响的；教会性是以基督教伴随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教育制度的不规范、办学经验的不足，加上开埠通商而导致的经济掠夺和宗教传播的需要而产生的；至于地域性，主要是列强在南方、北方以及东北的殖民割据造成的，如南方以英语为主，北方的法语、德语，东北和山东的日语。

这期间，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文馆谈起。俄罗斯文馆建立于乾隆年间（潘懋元，1998），也有较为详实的史料认定是在康熙年间（高文凤，1979；郝淑霞，2005；拉宾·帕维尔，2011），该文馆的成立主要是应对当时沙皇俄国的频繁东侵而带来的贸易、政治争端而储备相关翻译人才。俄罗斯文馆有着完整的教学组织、师生来源、教学课程、教学目标、评价体系和分配体系（拉宾·帕维尔，2011）。然而，那时的外语只在学校范围内传授，所教语种也局限于与中国接壤的少数几个国家的语言和周边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清朝，俄罗斯文馆作为外语教育机构直接为当时的政府提供了管理外语教学良好的经验，这些经验也用在了后来的京师同文馆的管理中（拉宾·帕维尔，2011）。

19世纪中叶，随着全球形势的发展变化，作为外语的主要语种已由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逐渐轮替为英国、美国使用的英语了。1862年京师同文馆（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建立，首先开设英文馆，但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又开设了法文、俄文、德文和东文课程，同时随着中国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加设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数学、医学等课程，从而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顾卫星，2004），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外语教育，同文馆注重翻译实践（笔译和口译）的教学，并采用了一种具体的外语教学模式——语法翻译法（穆雷，1999：7）。同文馆在低年级阶段主要集中强化英语语言训练，语言通顺之后，从中高年级开始，英语语言训练就开始和科学知识的教学相互融合，这种注重当时的社会需求、以科学教学促进语言的学习是当时外语教育的特色，对现在的外语教学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和带动之下，随后在全国主要大城市纷纷开展外语人才的培养机构。上海成立“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以外国语文为主修课程，兼修历史、地理与自然科学；在广州成立了“广方言馆”（又称“广州同文馆”）（1864年），培养八旗子弟翻译人才；1867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厂，内设翻译局，并开始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军事科学著作。这一时期英语翻译成了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和先进科学的最佳通道。在湖北武昌成立了“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专设“方言斋”（“方言学堂”），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西学。学生“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习英文、法文、俄文和德文；湖南乡绅创办的“东山精舍”（1895年）也设立“方言斋”，教习外国语文（张同冰、丁俊华，2002a）。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并于1903年设立“译学馆”（College of Language），继承并发展了同文馆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等。另外，其办学目标是在培养翻译和外语教育方面人才的基础上，训练他们以中西贯通为最高目标。这种“中西并重”的观念特别强调“外语学习并非仅是涉猎西学的门径，还是研读外国学术的辅助；学习外语的终极目的并非仅是语言文字的应用，而是会通中学与西学”（邱志红，2011）。“译学馆”是我国清末培养外交、外贸方面的笔译与口译人员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为清末乃至后来的民国政府输送了大量翻译与外交人才。

同一历史时期，由于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看到了西方科技在新型工业以及军事上的重要性，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